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第五辑

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

金光耀 杣景河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第五辑

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

金光耀 栾景河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 / 金光耀, 栾景河主编. —上
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5)
ISBN 978-7-5325-7131-4

I. ①民… II. ①金… ②栾… III. ①民族主义—中
国—近代—文集②外交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①D092.5-53②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71717 号

近代中国研究专刊 5

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

金光耀 栾景河 主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5.5 插页 2 字数 478,000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325-7131-4

K · 1828 定价: 9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本书出版获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教育部基地项目资助

项目号 0855D77091

前　　言

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学科联合主办的“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4月20—22日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根据学科发展与建设的需要，与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学科长期合作的结晶，此前两家单位已经联合举办过“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并有相关论文集出版。与前次会议不同的是，此次会议是一次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研讨会，海内外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青年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的历史问题；此次会议还专门聘请了该学科领域的资深学者对参会论文进行评审，此举既是为了提升此次会议讨论的深度，也体现出“前辈”学者对青年学者的深切关爱。学术研究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接力赛，此次会议仅仅是新一代青年学者继往开来的契机，未来的学术道路可谓漫长而修远，需要有志者去执着地探索。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民族运动的持续深入，无论是由于外敌的压迫，还是国人主动的反应，这一切都与那个时代英、法、日等列强推行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有关。民族主义本质上属于一种文化现象，虽然它常以“政治形式”出现。一般而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越悠久，其民族主义思想将愈发显得“根深蒂固”，其民族运动的爆发力也是惊天动地。

历史上，曾经以“汉唐盛世”闻名于世界的中国到了清末民初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欧美列强。这种今非昔比的国际境遇落差导致中国

的民族主义精英们内心时刻处于非常焦灼不安的紧张状态，他们急于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藉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实现中国复兴的伟大梦想。在这种历史语境下，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运动具有鲜明的“弱势民族意识”烙印，但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等为代表的民族领袖们在吸纳与继承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思想之后试图提出符合中国发展道路的民族进步纲领，从而使得中华民族在列强环伺的时局下仍能够率先在文化上“武装”起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和凝聚力，从而给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抹上了鲜明的“东方色彩”：一种既混乱又矛盾的文化民族主义。

在政治外交领域，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得尤为强劲有力。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主权问题，而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则是近代外交的基本内容。各国国情的不同，文化的差异，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对称，都直接影响到中外交涉的结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有两个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一是“弱国外交”；其二是深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上述两个时代特征是必须加以关注的。基于这种考虑，我们确定了民族主义与近代外交作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并着重从民族主义和民族运动的层面探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形成。

复旦大学历史系一向重视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以该学科为主体之一而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2004 年列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 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近年来，复旦大学历史系所举办的几次中外关系史研讨会得到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鼎立支持，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与他们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建朗研究员、李红岩研究员、张俊义研究员，以及中山大学历史系吴义雄教授、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吴翎君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立诚教授对参会文章作出了精彩点评。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唐云路、贺梦楚，以及国关学院邹磊博士为此次会议的后勤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和汗水。在此，我们谨代表所有参会人

员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上海古籍出版社是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的战略合作伙伴，长期以来一直秉持扶持学术的宗旨，对本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别是编辑老师在集刊收录文章较多、各种字体、注释不统一的情况下，认真细心地审校每一篇文章，其严肃认真的态度令人钦佩。

伴随着当代中国与世界交流关系的不断扩大与深化，有关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必将为我们和平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借鉴，这也是我们决定出版本集刊的宗旨。

编　　者

2013年12月2日

目 录

前言 (1)

条约与国际法

从“革命排满”到“废约反帝”

——孙中山革命理论中的民族主义与不平等

 条约 侯中军 (3)

二十世纪初中国收回租借地的尝试与曲折

——日俄战后威海卫问题的交涉 李文杰 (26)

清末商标保护立法与中外交涉 李永胜 (43)

近代中国“先秦国际法”研究的思想谱系 邹 磊 (58)

晚清政府的近代民族主义意识及其国际化努力

——以参与国际公约为视角 尹新华 (77)

1902—1903 年中美商约谈判

——力争主权与平等的公法实践 张卫明 (95)

专 题 论 文

“亡国阴影”下的政争

——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民族运动 马建标 (127)

中国外交近代转型的节点

——简论庚子事变前后若干外交问题

(1900—1901) 戴海斌 (168)

关于汉译本《华夷变态》的初步考察

——清末留日中国学生宣扬民族主义之一例 郭 阳 (188)

中日实业代表团的互访

——跨出国门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 于文浩 (210)

国民与国家：新中国主权确立的社会意义 吕 迅 (250)

中英关系变动背景下“费唐报告”的出笼及搁浅 王 敏 (268)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外交协会述论 熊 斌 (294)

民国初期的无线电合同纠纷与对外通信权

——论 20 世纪 10 年代列强在华筹设大无线

电台的交涉 薛轶群 (326)

民众运动与“革命外交”

——以 1927 年汉案交涉为中心 潘 星 (356)

“祖国将士”被拘之后

——香港“屈士文事件”发微 孙 扬 (408)

人物研究

徐世昌与“五四”外交

——对三则史实的考析 王学斌 (435)

从争取西援到谋求平等

——试论抗战时期宋美龄的英文书写 李 珊 (449)

1922 年“好人政府”探析

——以外交系为中心 罗 毅 (466)

国民政府褒扬梁启超史事考 赵中亚 (484)

重光葵与“一·二八事变” 张宁静 (504)

学 术 动 态

外交史研究的趋向

——近十年来民国外交史研究综述

(2002—2011) 唐云路 (535)

条约与国际法

从“革命排满”到“废约反帝”

——孙中山革命理论中的民族主义与不平等条约

侯中军

学界关于民族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尤其是关于概念的定义更是众说纷纭。有学者指出:“既然国内外的学人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说法甚多,我认为要给‘民族’或‘民族主义’下一界说,且能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恐怕很难。”^①透过学者们之间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厘清民族主义的内涵与特质,如果不对民族主义做价值评判,种种学说之间还是有许多共同兼容的东西可以讨论的。^②或许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主义仅仅是个框架,无须把它落得太实,仍然要注意其他意识形态(包括前现代的精神传统)本身的自主性以及框架内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可能存在的复杂的交叠、流动与紧张关系。”^③虽然对民族主义的界定存在分歧,但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认识大体一致。学界认为,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或初始阶段,“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分水岭,“五四”以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④当然,正如学者们所认识的那样,中国早已存在自身的民族主义,无论是孙中山还是章太炎,都承认中国存在传统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曾认为:“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⑤孙中山亦有相似的看法:“盖民族主

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烁者也。”^⑥近来的研究指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⑦显然，大家意识到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包含有中国特色的民族主义概念，这种概念在近代以前的东亚发挥着实际的效力，但其与近代民族主义存在明显区别，不存在“民族建国”的因素，与不平等条约等近代化概念不存在联系。

不平等条约与民族主义发展的内在联系，一直未有明确论述，究竟是民族主义促使了对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运动的兴起，或是不平等条约刺激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二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具体通过何种方式联系起来，这都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文着重探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转变过程。试图厘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推动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演变，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过程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孙中山为何要在辛亥以后重新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列为三民主义中的第一个主义。

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孙中山 对不平等条约概念的认知

推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主要代表人物当属孙中山和梁启超，一般认为孙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梁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代表。虽然孙中山早在 1894 年创立兴中会时就已经表达了其民族革命思想的要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该口号在檀香山兴中会的入会盟书中提出，这里的“鞑虏”还是一个模糊的概念，结合兴中会章程中“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有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等语，似乎更多强调列强的侵权，对于满族的认识尚不明确，对列强的认识

同样是模糊的。^⑧在此之后，孙中山致力于武装起义，为实现兴中会所定章程而开始革命实践。在 1897 年的一封函件中，孙中山意识到，有人认为他的革命活动是把“我那悲惨的同胞从鞑靼的桎梏下解救出来”，这里用了“鞑靼”一词，但显然是指清政府的统治，而非种族的统治，进一步而言，应是满族皇帝的统治，重点仍然在皇权。^⑨孙中山后来的言行可以表明此点。

在 1901 年春与林奇的一次谈话中，孙中山其开始使用“民族”一词，“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这里仍然是将“中国人”视为一个“民族”，而没有区分汉、满等民族。笔者以为，此时孙中山并非有意混淆满族与汉族及中国人的概念，而是因为在其革命理论中满族作为一个种族并非是要推翻的革命对象，皇帝才是要打倒的对象，他告诉林奇：“当外国人劫掠了京城亵渎了神明，皇权的威信扫地以尽，位于北京中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宫遭到侵略者铁蹄的蹂躏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就在成熟了。”^⑩据笔者所见材料，孙中山将满人作为革命的对象加以阐述是在 1903 年 9 月。在这一年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孙曾这样表述满族对汉族的统治：“至满胡以异种入主中原，则政府与人民之隔膜尤甚……汉族蒙祸之大，自古未有若斯之酷也”，“其施政之策，务以灭绝汉种爱国之心，涣散汉种合群之志”。至于能否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满族人，则更非可能，对于图强变法，“满人则曰：‘变法维新，汉人之利，满人之害。’又曰：‘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⑪这些表述与前期兴中会成立前后对国家危急形势的强调相比，着重点已经有所变化，前期强调国家的危难，要求国人奋起救国，但未明确须通过推翻满人统治以救国，后期显然增加了关于满族作为一个种族统治中国的表述内容，排满口号的提出已经成熟。

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在檀香山的一次演说中使用了“民族主义”一词，号召中国人民“一定要在非满族的中国人中间发扬民族主义精神”，并相信“这种精神一经唤起，中华民族必将使其四亿人民的力量奋起并永远推翻满清王朝”。^⑫至此，可以确认孙中山从兴中会

确立的“驱除鞑虏”的民族主义指向已经渐趋明朗，即要在非满族中发展民族主义精神，并以之推翻清朝统治。到同盟会成立前，经过与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论战，孙中山的种族革命思想得到了更加清晰的阐述：“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⑬学界对孙中山早期民族主义的研究已经很丰富，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有人将其归结为“一是三阶段说；一是两时期说；一是五时期说”，分歧的由来在于“对孙中山民族主义内容的看法不一”。^⑭三阶段说认为从 1894 年兴中会成立到 1905 年同盟会成立，是以“仇满”为中心口号的阶段。笔者赞同将 1905 年之前划分为一个阶段，但仇满是需要具体加以区分的，从 1894 年兴中会成立到 1905 年同盟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一个逐渐发展变化的过程，而不是笼统的反满。

梁启超与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宣扬，大约同时出现，但却并不相同。1901 年梁启超写作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最早向国人介绍了“民族主义”一词：“今日之欧美，则民族主义与民族帝国主义相嬗之时代也；今日之亚洲，则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嬗之时代也。”^⑮二者之间关于民族建国的分歧体现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兴起阶段的内部争论。从 1894 年创立兴中会始，直到 1905 年创立同盟会，孙中山号召革命，并逐步发展出革命的中心思想，即“革命排满”，体现在同盟会的革命宗旨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有学者总结性指出，孙中山最初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反满的民族主义，虽然此时孙的民族主义已经开始具有近代民族主义的性质，但仍难以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嫌疑。^⑯自明确提出民族主义口号后，孙中山认为革命形势发展迅速，在 1905 年 8 月于东京的演说中特别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⑰

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历程中另一个代表人物梁启超那里，对“革命排满”是存有疑问的。梁启超质问：所谓“排满”，是排满族

人？还是排满人所建立的恶政府？如果是排满族人，而换汉族人为政，不过是“将腐败而亦神圣之”，如果只是排满人建立的恶政府，则与排不排满族人并无多大关系，恶政府中的汉族人也是需要排除的。^⑯两人对晚清政府所面临的世界大势都是清楚的，对中国受帝国主义各国的压迫都有深刻地感受，而在这种大背景下，对如何走出这种困境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孙中山的排满显然是革命的策略，其后来在民族主义认识上的变化也正说明了此点。

在近代民族主义初露端倪之际，不平等条约已经形成了体系，其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已经实实在在地显现出来。自中英《南京条约》订立后，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逐步增加，丧失的国家权利也逐步增多，到《辛丑和约》时，可以认为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发展到了极致。^⑰晚清国人对不平等条约的认识相当模糊，走过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这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对近代国际法以及外交惯例的无知。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在最初，很多不平等条约特权是清政府主动出让给列强的，茫然丧失权利而不自觉。^⑱随着国际法的逐步引入，在中国人的认识层面，已经意识到这些条约对中国构成了危害，虽然有偶尔的批评声音，但均未成系统，更谈不上以近代国际法知识来剖析这些强加给中国的条约。经过戊戌维新运动的发酿，到20世纪初年，“不平等条约”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步发展起来的，此一时期亦是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急剧发展期，“民族主义”与“不平等条约”之认识体现在孙中山身上是怎样的一种状况，二者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目前都还缺乏系统的阐述。前文提及，孙中山在1903年第一次提及“民族主义”一词，而首次提及“不平等条约”则是在1906年。^⑲这一年孙中山口授汪精卫撰写《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文，文中出现有“满洲政府，外交丑劣，与各国结种种不平等之条约”。^⑳如果以正式出现的时间来看，显然“民族主义”一词要早于“不平等条约”，如果将梁启超提出民族主义一词的时间计算在内，则“民族主